

#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治理及历史经验

张卫波\*

**【摘要】**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社会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建设民主公正、清正廉明的新社会；提倡发展生产，开展“双拥”运动，使得党政军民关系越来越密切；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法治建设，保障人民权利；改造“二流子”和巫神，加强社会救助，稳定社会秩序；严禁种食鸦片，净化社会风气。这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方式和历史经验，对今天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抗日根据地 社会建设 社会治理 历史经验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只有4万多党员，而到抗战胜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了120余万，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也达到了132万人，民兵发展到了260余万人。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发展到了19个，面积达到约100万平方公里，抗日根据地人口接近1亿。在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影响深远。

## 一、建设民主公正、清正廉明的新社会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及社会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歌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是人民群众对抗日根据地社会新气象的生动描述，反映了人们对这种新社会的向往。人们之所以会对根据地有这样的认识和好评，除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抗战外，还在于根据地的社会民主公正、清正廉明。

这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

\* 张卫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部教授。

“三三制”的民主政治。所谓“三三制”，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进行过说明，认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在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在他看来，所谓领导权，就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sup>①</sup>

为了贯彻执行“三三制”，为了保证选举的民主公正，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18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sup>②</sup>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5条进一步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sup>③</sup>

为了贯彻民主建政的原则，各抗日根据地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选举方式，发明了“红绿票选法”“豆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香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乍（举）胳膊”的选举方法。陕甘宁边区民众用民谣反映了他们对“豆选法”等民主选举方式的认可和赞同，唱道：“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

在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动员推动下，人民群众选举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投票。例如：陕甘宁边区选民参选率达到75%—80%，绥德、清涧、延川等县达到90%以上；晋察冀边区选民参选率达到70%以上，平山县第十五区高达99%，灵寿县第七区高达97%<sup>④</sup>。如此广泛而普遍的民主选举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充分体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民主性质，推动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根据“三三制”原则，根据地各政府在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也广泛吸纳了各党各派的力量。例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9人中，共产党员3人，党外人士6人；边区政府18个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均为三分之一。再如：1942年10月24日，晋西北（晋绥）临时参议会召开会议举行选举时，共产党员49人当选，超过了应占比例的三分之一，为此共产党退出两个名额，实为47名参议员，不足三分之一。

通过贯彻实行“三三制”，很多中共党外人士不仅参加了抗日根据地政权，而且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如：李鼎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安文钦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国民党党员宋维周、邢肇棠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苏北名绅韩国钧任苏北参议会名誉议长、朱履先任副议长；爱国人士朱雨江、赵坚、刘子谷分任津浦路东、路西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参议会副议长。鉴于陕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模范作用，八路军留守兵团还专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赠送了“民主典范”的匾额。

其次，为了在抗日根据地形成清正廉明的社会环境，根据地民主政府严禁政府工作人员享受特权，倡导节俭生活。例如：当时国民党中将每月薪俸为400元、县长每月薪俸为180元，而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规定从基层

的乡长到边区政府主席，“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陕甘宁边区的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有五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二元半，每天粮食一斤四两，菜钱四分。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元至30元之间”；在晋察冀边区，“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八元，各县行政工作人员生活费普遍都在十元左右，一切个人的应酬、膳食、衣服且均为自备，而许多廉洁的县长还节约其生活费之一部捐助于抗战或群众团体”。<sup>⑤</sup>

为了严惩贪腐行为，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一）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并规定：上述罪犯还“应追缴其全部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sup>⑥</sup>之后，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sup>⑦</sup>

在颁布法令的基础上，抗日根据地政府还用严厉措施惩治腐败，于1941年枪决了肖玉璧。肖玉璧曾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逃跑。鉴于性质恶劣，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之后，《解放日报》还刊登文章指出：“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这极大地遏制了贪腐案件的发生。据统计，仅1937年到1938年两年时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

依法处理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由于惩贪措施有力，陕甘宁边区的贪腐案件逐年下降，如1939年发生360起，1940年发生646起，1941年下降为153起。

这为根据地的社会建设营造了一种清正廉洁的良好社会风气和环境，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吏治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很多知识青年之所以不远千里、克服种种困难由大后方来到抗日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为了抗日，还缘于对根据地这种民主公正、清正廉明的新社会的追求和向往。

## 二、提倡发展生产，开展“双拥”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遭遇极端困难。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包围和封锁，甚至提出“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战士没有衣穿，没有粮食和菜吃，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于1939年2月向全党和根据地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同时，党中央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1943年10月又提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sup>⑧</sup>

根据这一要求，抗日根据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和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发挥了表率模范作用。特别是1941年春天，王震带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屯垦。他们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风餐露宿，开展开荒劳动竞赛，种上蔬菜和水稻，终于将南泥湾改变成了陕北的江南。

经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粮食产量由1938年的120万石，增加到了1944年的180万石；棉花产量由1941年的50万斤，猛增到1944年300多万斤。到1945年，边区广大农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有的还做到了“耕一余一”。其中，三五九旅平均每人开荒18亩，除吃用全部实现自给外，做到了“耕一余一”。与此同时，根据地的工业和商业也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例如抗战之前，延安仅有123家小店，到1943年已经拥有473家店铺。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著名的“陕北三宝”——食盐、皮毛、甜甘草，成为边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sup>⑨</sup>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各根据地普遍兴起了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sup>⑩</sup>。通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根据地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生活有所改善。据统计，晋绥区1943年后减租减息的农民有56175户，减租粮50977石，清理旧债户10590户，获粮共185515石，法币250081元，白洋152020元，赎地406828垧，买地165259亩。这使得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正如王稼祥所说：“这种政策可以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人民的抗战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sup>⑪</sup>

不仅如此，为了使得党政军民融洽协调，从而推动抗战和生产，中共中央还大力倡导“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开展“双拥”运动。1942年10月，中共中

央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由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共同发起开展“拥军拥政运动月”。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决定每年春节前后要通过各种形式慰问驻军。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拥政爱民运动月的指示》。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中提出：“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sup>⑫</sup>10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指出：“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他认为“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sup>⑬</sup>。根据这些指示和要求，边区各级政府、各部队都开展了广泛的拥军优属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使得党政军民关系越来越密切。

### 三、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法治建设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脱离生产人员一度很多。据李维汉回忆，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14000人，1938年年16000人，1939年49000人，1940年61000人，1941年73000人。与之相应，人民负担逐年增加：1937年征收公粮14000石（1石为300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28%；1938年征收公粮15000石，1939年征收公粮6万



石, 1940年征收公粮10万石, 1941年激增至20万石, 占总产量13.8%。<sup>⑭</sup>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1941年11月, 民主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建议。同年12月, 中共中央采纳这一建议, 并发出“精兵简政”指示, 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 精简机关, 充实连队, 加强基层, 提高效能, 节约人力物力。1942年8月4日, 毛泽东在《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中, 明确指出: “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 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 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 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 弄到民困军愁, 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 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 但总方向是相同的。”8月19日, 在给时任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 以及时任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的信中, 又说: “今天所谈第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 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 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 而精简包括精少、效能、统一诸方面。”“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 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 过去还只是耳边风。”<sup>⑮</sup>9月7日, 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再次强调: “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 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认为, 实行精兵简政, 不仅有利于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 而且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指出: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 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 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 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 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sup>⑯</sup>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1941年至1943年, 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通过精兵简政, 政府人员大幅削减, 人民的负担也随之下降。例如: 陕甘宁边区1945年征收的公粮, 从1942年的20万担减少到12万担; 延安县1941年征用民力60025人, 1942年减少到28493人, 减幅52.4%; 绥德县1941年征用民力74196人, 1942年减少到900人<sup>⑰</sup>。这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民主政府的办公效率和威望。

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在精兵简政的同时, 还十分注重法治建设, 以从法律层面保障人民各项权利和人民的身心健康。1940年12月, 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提出: “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另一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1941年5月,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七条明确规定: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 政权, 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 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 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改进司法制度, 坚决废止肉刑, 重证据不重口供。”<sup>⑱</sup>同年11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演说时再次强调: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 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sup>⑲</sup>

为了保障人权, 各根据地民主政府都制定了名称不一的人权保障法律和条例。例如: 1940年11月11日, 山东抗日根据地制定《人权保障条例》; 1941年11月, 陕甘宁边区制定《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1942年11月, 晋西北边区制定《保障人权条例》; 1943年, 渤海区制定《人权保障条例执行细则》。这为根据地人民人权的保护和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

#### 四、改造“二流子”和巫神，加强社会救助

在抗日根据地，当时一方面涌现出了很多劳动模范，催人奋进；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流民，包括不少的“二流子”和巫神。据统计，仅仅在陕甘宁边区就有2000多名巫神。这些“二流子”和巫神，大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甚至装神弄鬼，不仅浪费、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而且还造成社会动荡，导致社会风气污浊、封建迷信猖獗，可谓根据地社会治理的顽症痼疾。

针对游荡于乡间的“二流子”，1943年11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所做的《组织起来》的报告中要求：“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sup>②</sup>为了改造“二流子”，根据地政府不仅组织“二流子”参加集体劳动、督促其劳动，而且还通过闹秧歌等娱乐方式，加强对“二流子”的思想和改造。通过对“二流子”的改造，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使乡风出现了新面貌。这也为根据地政府积累了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的经验。

针对巫神盛行的情况，为了破除农民的封建迷信观念，根据地政府十分注重对农民进行科学知识教育，通过讲演、报刊、壁报、展览，以及出版通俗科普读物等方式，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据统计，在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共组织开展了500多次各类卫生常识宣讲会，参会的人员达到30000多人次；《解放日报》专门开辟了科普专栏，共办了62期，刊登科普类文章200余篇；1942年至1944年，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反封建迷信、宣传科学常识的科普读物和材料达80000余册。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还在杨家岭大礼堂举办了延安卫生展览会。通过这些宣传，根据地的封建迷信活动得到了遏制，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得到了改变，更加趋于健康科学。

这对推动根据地的移风易俗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根据地流民中，除了“二流子”、巫神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难民、灾民。当时根据地自然灾害频发，例如：1942年陕甘宁边区遭遇了严重的水患，损失惨重，各县共有灾民54500余人，死618人，伤252人，无下落者约352人，被冲毁房屋共约7000栋又2200间，被淹耕地共50880亩，农业损失约1.322亿元，死伤牲畜约1000多头，其他财产损失约3000万元。<sup>③</sup>

面对自然灾害对生产造成的危害，以及大量难民无以为生的境况，根据地政府实行以工代赈，兴办工厂，兴修水利，吸收难民到工厂做工，参加水利建设，安置难民。同时，政府拨给难民贷款、土地、种子、食粮，为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创造了条件。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合作社，促使农民之间互相协作，共同发展生产。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有效改善了难民、灾民的困难境遇，增强了他们对根据地民主政府的信任和认同。这对稳定根据地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 五、严禁种食鸦片，净化社会风气

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保障根据地军民的身心健康，边区政府严禁烟、毒的种植和吸食。近代以来，烟毒泛滥，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是影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顽症痼疾。日军入侵华北之后，为了达到毒化中国军民的目的，更是通过诱惑或胁迫手段，强制将山西的太原、平定、清源、榆次、平遥、介休等26县确定为种烟区，强迫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其中，仅在太谷一个县，烟田竟达6000余亩，而太谷县的第一大村范村，烟田竟然占全村土地的70%。在河南，种植鸦片的耕地面积甚至达到了总土地面积的3%。在鸦片的毒害下，很多家庭家破人亡，人民身体虚弱，形容枯槁。

面对烟毒泛滥的乱象，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通过立法等各种措施对烟毒祸害进行了治理和禁止。例如，仅晋察冀边区政府就先后出台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查禁种烟令》《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开展灭毒运动的命令》《关于晋管局卡及检查站稽查与处理违禁物品的决定》《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加管理毒品的布告》《晋察冀边区鸦片缉私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戒烟暂时办法》等近20种法令，禁止鸦片的种植和吸食，并采取措施强制戒烟。其他根据地也制定和颁布了类似的法律条例。这些措施在根本上禁绝了鸦片在抗日根据地的泛滥和吸食，保护了根据地民众的身心健康，改变了因吸食鸦片而偷盗犯罪的社会风气。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同国民党在大后方的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毛泽东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论会上发表演讲时，将根据地的社会面貌总结为“十不”。他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sup>②</sup>1944年秋，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赴晋绥边区进行实地调查访问时，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边区的政府官员和部队从事垦荒、纺织、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他们将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力，获取抗战的人力。”<sup>③</sup>

## 六、历史经验：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回顾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方面

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基本落脚点和出发点，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此，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于1942年12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他还说，要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sup>④</sup>1943年11月，又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他认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sup>⑤</sup>。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是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

与之相应的是，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也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大力支持，使之不断发展壮大，并表现出蓬勃的生气和力量。对于这一点，不仅国内民众看得很清楚，而且一些在华外国人也看得十分明白。美国时任驻华外交官台维斯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sup>⑥</sup>以此为由，他断言，“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美国时任驻华外交官谢伟思也指出，



“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力量。”他认为，共产党能够存在、发展并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人民允许、支持并全心全意与他们共同作战。这里军队和人民是完全团结了”。在他看来，“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之被消灭成为不可能，从这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他甚至预言：“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关于这两点至今尚无愿意或能做的征兆），不然，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sup>⑩</sup>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根据地军民的支持下，抗日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其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而且对今天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有一定启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2页。

②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28、535页。

⑤ 郭德宏：《中共历史探微》，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5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⑦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⑨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延安大生产运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28、129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⑪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02、603页。

⑫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页。

⑬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⑭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页。

⑮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439页。

⑯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883、884页。

⑰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⑱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335页。

⑲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⑳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㉑ 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8页。

㉒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㉓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6页。

㉔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㉕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㉖ 《驻华外交官的备忘录（1943—1945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0、596、589、596页。

（责任编辑：葛云）